

Autumn 2017



# 亚洲研究动态

## Asia Research Network

September No.38

2017年9月 第三十八期



##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第 38 期  
2017 年 9 月

主编：郭棲庆 赵宗锋

编辑：王惠英

设计：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86-10-88813845

传真：86-10-88816556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综合教学楼 1041 室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

### 出版人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彭 龙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 编委会顾问

林建华 北京大学校长

邱 勇 清华大学校长

李 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刘 伟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许宁生 复旦大学校长

龚 克 南开大学校长

胡正荣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

彭 龙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潘一山 辽宁大学校长

朴永浩 延边大学校长

吴朝晖 浙江大学校长

Phung Xuan Nha 越南国立大学校长

Pirom Kamol-Ratanaku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校长

Khlot Thyda 柬埔寨皇家学院院长

Soukkongseng Saignaleuth 老挝国立大学校长

Regsuren Bat-Erdene 蒙古国立大学校长

Pho Kaung 缅甸仰光大学校长

### 编辑委员会

吴志攀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

李 越 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周云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伊志宏 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光耀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杨 龙 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丁俊杰 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陆杰荣 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朴灿奎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罗卫东 浙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Bouadam Sengkhamkhoutlavong 老挝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Kyaw Naing 缅甸仰光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rapin Manomaiviboo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Bazartseren Boldgiv 蒙古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Sum Chhum Bun 柬埔寨皇家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Nguyen Thi Anh Thu 越南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郭棲庆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副主任

赵宗锋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执行副主任

# CONTENTS

## 目录



### P.02

→ 2017年7月7日上午，“天津论坛2017”在津隆重开幕。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创新与合作：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发展与区域治理”，来自中国两岸三地、韩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150余位各界嘉宾参加了开幕式。



### P.07

→ 2017年7月30日至8月2日，由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和复旦大学共同主办，河西学院与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第十三届国内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联席会议在河西学院图书馆学术厅举办，会议的主题是“合作与发展：中国亚洲研究的未来”。

## 特稿

- 02 “天津论坛2017”举行
- 07 第十三届国内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联席会议在河西学院举行

## 学术活动

- 10 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举行
- 13 “金砖国家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 15 “2017 中国传播论坛暨金砖国家传媒国际研讨会”举行
- 17 第八届中日韩青年论坛举行
- 18 “全球史与中国2017”学术系列讲座第一至第八讲举行

## 研究进展

- 24 越南本土人类学的研究主题与研究趋势
- 33 印度高等教育“保留政策”及其启示



## “天津论坛 2017” 举行

2017年7月7日上午，“天津论坛2017”在津隆重开幕。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创新与合作：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发展与区域治理”，来自中国两岸三地、韩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150余位各界嘉宾参加了开幕式。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俊芳，天津市副市长孙文魁，全球合作基金会主席、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韩国SK株式会社董事长兼CEO崔泰源，韩国济州特别自治道知事元喜龙，韩国国立仁川大学校长赵东成，新加坡国立大

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中欧论坛”创始人、南开大学客座教授高大伟，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等嘉宾学者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南开大学校长、论坛组委会主任龚克主持。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南开大学副校长、论坛组委会副主任朱光磊、严纯华一同参加了开幕式。

开幕式上，孙文魁、崔泰源、罗马诺·普罗迪、元喜龙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孙文魁代表天津市委市政府向远道而来的



龚克



孙文魁



崔泰源



罗马诺·普罗迪



元喜龙



朴仁国

学者嘉宾表示欢迎，对论坛的举办表示祝贺。他指出，“天津论坛 2017”汇集全球智力，围绕“创新与合作”这一主题，探讨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发展及区域治理，将助力城市管理水平的提升。期望与会嘉宾围绕论坛主题深入研讨，交流分享观点，提出对策建议，形成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为国内外城市发展贡献智慧。

崔泰源代表 SK 集团以及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他表示，促进城市化发展及区域发展，应采取系统化的方式，进行多方面协作。在城市管理中，可在经济模型、产业分布及社会治理、环境保护等方面加强紧密合作。希望天津论坛的讨论成果能为城市规划者提供参

考，产生富有创新性、建设性的理论观点。

罗马诺·普罗迪指出，当今城市治理面临着新的历史任务，即平衡城乡区别、减少城乡差距。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要注意避免由于城镇化过度扩张带来的负面影响，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可用资源。对此，可以聚焦优化城市经济结构、城市构造、城市布局以及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希望论坛能为城市发展建言献策，使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享受城市所带来的优势。

元喜龙表示，天津是重要的港口城市，也是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济州希望能够与天津携手开启合作大门，期待论坛的举办能成为两地友好交流的纽带。许多国家和城市



林毅夫



赵东成



郑永年

都面临着急速发展城市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能源问题等，希望大家交流宝贵经验，助力战略方针的制定，为城市走向更美好的未来打下坚实基础。

开幕式后，朴仁国主持了主旨演讲。林毅夫、赵东成、郑永年、高大伟围绕本次论坛主题，先后发表了主旨演讲。他们从全球化的背景出发，紧扣国际区域化和国内区域化对城市的发展和治理的影响问题，以创新和共享作为切入点，就如何推动城市发展与治理进行了深入阐述，赢得了与会嘉宾的阵阵掌声。

林毅夫以“‘一带一路’与自贸区：中国新的对外开放战略”为题作了主旨演讲。他借助数据说明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并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的体现，渐进务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据发展不断调整政策是中国取得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林毅夫引用“要致富，先修路”，强调要发展必须完善基础设施。他指出，“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新的国际合作方式、国际合作理念，通过以基础设施为抓手，进一步推动所有发展中国家成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来实现共同繁荣。

赵东成以“4次产业革命时代的人才育成方案”为题作了发言。他简要介绍了五种国家经济战略模式，并通过分析韩国国家经济策略，阐述了韩国经济的发展道路。通过比较大学教育1.0、2.0、3.0模式的差异，他指出未来发展方向：大学4.0模式，并介绍了大学4.0模式下的两种类型：alpha模式和beta模式，同时列举了两种模式的一些海外发展情况，进一步指出未来大学发展目标是大学4.0：alpha+beta。

郑永年以“开放、移民与城市创新”为题作了主旨发言。他提到，雄安新区、大都市区的提出引起了人们对于城市化的关注，城市化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巨大增长点。城市发展的历史，就是移民的历史，没有移民，就不会有城市化。建设雄安新区意义深远，应将其发展成为新时期一个以知识为核心的新型城市，来吸引优秀人才资源。

高大伟认为，四个因素的组合叠加创造了看似复杂的世界。第一个因素是人口，人口的增长增加了世界的“复杂性”，人类寿命的延长加大了医疗系统的压力；二是颠覆性的技术变革，数字技术、量子通讯与计算技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网络安全、世界和平提出了



高大伟



朱光磊



比亚森·瓜里亚尔特

挑战；三是权利的摆脱，智能手机普及的当下，信息就是权利、力量；四是观念多极化的存在。他建议从系统上解决城市问题，让城市、让世界变得更加智能、富有智慧。

“天津论坛 2017”设有 1 个城市管理者对话会“国际化大都市面临的挑战与应对”、1 个圆桌会议“城市转型问题探讨”和“统筹发展下的城市发展政策选择”、“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能源和产业”、“多方参与下的城市治理”、“东北亚的区域安全与经贸合作”4 个分论坛。

7 月 8 日，论坛举行闭幕式。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在闭幕式上发表总结致辞，南开大学副校长、论坛组委会副主任朱光磊做大会总结发言。会议由论坛组委会秘书长吴志成主持。

朴仁国在致辞中对南开大学的大力支持、与会嘉宾的积极参与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当前世界城市快速增长，城镇化趋势日益明显，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更为突出。快速的城镇化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城市凭着经济创新水平、资源分配、高等教育、文化交融、社会服务、政治参与度等优势，聚集了众多初创企业和先进技术，也吸引了大量优秀人

才。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代表了发展的希望。但与此同时，城市的快速增长，也带来了住房、交通、医疗、教育、城乡差距、收入不平等等诸多问题。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让城市具有包容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需要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创新，让城市变得更加清洁、安全、宜居、智能。

朱光磊在总结发言中表示，本次论坛内容充实，主旨演讲视野宏观、观点精要，主题聚焦城市治理，特色贯穿论坛始终，辐射区域发展，推动创新合作，大家立足国际背景、比较研究，多视角认识、观察城市发展和治理等问题，取得了丰硕成果。他说，天津论坛作为南开大学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打造的品牌项目，进一步提升了含金量，历经两届，高端交流平台基本成型，学术影响与社会效益初步显现；论坛坚持选择具有时代特色与社会重大关切的前沿问题，在议程设置上特别强调学科交叉的特殊优势；与会嘉宾的倾情参与，组委会及各方的凝心聚力，严谨务实地组织工作是论坛成功的三大要素；各位与会学者们“大处着眼、细处着手”的学术修养，值得后辈年轻人不断学习。南开大学愿意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一起，使“天



津论坛”从“品牌项目”向着金牌项目继续前进，共同为区域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西班牙巴塞罗那市前任总规划建筑师比亚森·瓜里亚尔特 (Vicente Guallart) 在闭幕式上发表了题为“建设人性化尺度的城市”的主旨演讲。他从城市规划和设计等角度，向与会人员分享了巴塞罗那诸多项目建设的方法经验，包括基础设施、建筑材料、城市改造、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等内容。他谈到，未来的城市发展应该更加绿色、现代、可持续，我们要相互交流学习，推动创新，通过国际合作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变为现实。

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南开大学教授陈宗胜在“‘葫芦形’收入分配格局与推进城镇化”的主题演讲中指出，现代社会或者工业化社会的分配格局应该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它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及中产阶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从较为平均的“飞碟形”到差别逐渐扩大的“金字塔形”，又由于在收入差别扩大中，二元结构转换缓慢，经济社会结构调整不平衡，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出葫芦形变异迹象，这是中等收入陷阱

的重要特征性现象。他强调，我们要持续推进城镇化，完成二元结构转换，实现一元现代经济，同时改进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别，消除“葫芦形”，实现“橄榄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天津论坛是由南开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共同出资主办的系列国际学术论坛，2015年成功举办了第一届，本届是第二届。论坛以天津在中国和亚洲的重要地位出发，依托南开大学具有的多学科云集、国际化程度高的优势，借助天津市政府和有关单位的支持，紧扣中国、韩国及东北亚各国的发展和东北亚一体化发展的需要，选择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主题，广邀国内外知名学者、政要、企业界人士以及其他领域的专业精英，通过多学科研究，深入探讨多方面相关问题，以期提高中国和东北亚地区学者对东北亚地区及其一体化的研究水平，为东北亚地区及其一体化的发展提出对策性建议。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照片由天津论坛组委会秘书处提供

## 第十三届国内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联席会议 在河西学院举行



2017年7月30日至8月2日，由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和复旦大学共同主办，河西学院与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第十三届国内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联席会议在河西学院图书馆学术厅举办，会议的主题是“合作与发展：中国亚洲研究的未来”。

7月31日上午，大会开幕式举行。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副理事

长刘承功，河西学院副校长张汉焱，张掖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向机，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致辞。开幕式由刘承功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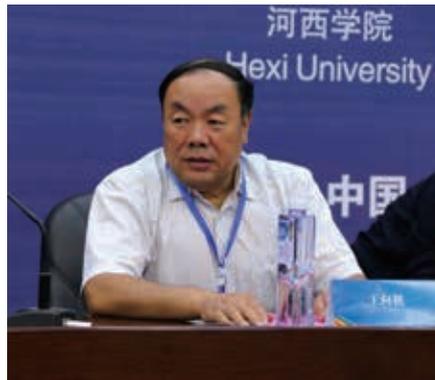
主旨演讲阶段，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雄、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高荣分别以“延续还是创新：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和“河西走廊的历史与文化”为题作了精彩的演讲，并进行了现场问答互动活动。主旨演讲环节由



刘承功



张汉焱



王向机



朴仁国



葛剑雄



高荣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金光耀主持。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南开大学副校长严纯华，山东大学副校长胡金焱，中共张掖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康清，河西学院党委书记黎志强，甘肃省教育厅外事处副处长张捷等领导，以及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北京论坛、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信息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南京论坛、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山东论坛、上海论坛、天津论坛、浙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中

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等 16 个单位的负责人和专家学者以及河西学院师生共计 200 多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当天下午在河西讲堂一号会议室举行了国内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交流会议，第一场会议由山东大学副校长胡金焱主持，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北京论坛秘书处常务副秘书长谷雪、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副主任郭棲庆、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金光耀、辽宁大学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胡胜、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王月清、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杨龙、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李东海等分别作了交流发言。



第二场会议由南开大学副校长严纯华主持，山东大学副校长胡金焱，上海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罗倩，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玉兰，浙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副主任金健人，中国传媒大学亚洲媒体研究中心副主任文春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交流处副处长、亚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吕捷，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亚非处处长刘影翔等分别作了交流发言。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主持了以“进一步推进亚洲研究中心的相互交流和国际合作”为主题的圆桌讨论。

闭幕式由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副理事长刘承功主持。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作了总结讲话。他指出，本届会议通过研究讨论中心运营计划，进一步增进了彼此间的交流与合作，为创意人才培养、动态信息共享、学术成果交流搭建了平台，进一步促进了世界学术发展和人类社会的繁荣与进步。本次会议的目的是交流各中心工作成

就与特色，展望中国亚洲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及预期目标，探讨各亚洲研究中心之间合作与发展的多样性方式。

会议产生了下一届国内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联席会议的主办单位，第十四届国内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联席会议拟由北京大学主办，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承办。

国内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联席会议，是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在中国国内资助的11个亚洲研究中心和五个国际性论坛每年一度的工作交流年会。每年由各亚洲研究中心轮流承办。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一行参观了河西大学大学生艺术创意中心、校史馆、贾植芳藏书陈列馆、复旦大学对口支援成果展、河西讲堂和河西学院校园。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 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举行



2017年9月20日上午，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辟雍广场开幕。本届大会主题是“儒家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胜俊，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家义，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连辑，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柏继民，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季缙绮，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原社长、北京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孔子第79代嫡长孙、中华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协会会长、至圣孔子基金会会长孔垂长出席大会开幕式。开幕式由山东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守刚主持。

王胜俊在致辞中向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说，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也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世

界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充分展现了我们党、国家、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坚定自信和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大国担当，在世界儒学界、汉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应对人类共同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应从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吸纳有益成分。要在传承创新中更好引领未来，不断深化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世界各民族优秀思想文化的挖掘阐发和传播交流；在交流互鉴中更好促进融合，使各国民众相互理解和包容、相互支持和帮助；在友好交往中精心呵护，消除隔阂分歧，摒弃矛盾对立；倡导丝路精神，跨越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在共建共赢中实现共同繁荣。希望各国专家学者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世界儒学大会，大力推进儒家思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精神力量。

刘家义在致辞中代表山东省委、省政府和9900多万山东人民，向出席会议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委、省政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视察山东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用好齐鲁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阐发，为做好山东各项工作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和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着力推动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全力构建世界儒学研究及传播高端平台，引领世界儒学发展方向；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扎实推进美德山东、文明山东、诚信山东建设；把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红色基因结合起来，大力弘扬沂蒙精神，在齐鲁大地形成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文明风尚、人文氛围；进一步推动齐鲁文化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故事山东篇，展示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连辑在致辞中谈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经成为21世纪的国家发展潮流。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发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后，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更加全面和机制化，客观上让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民命运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连辑强调，中华文化中的“和”文化，是“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源泉和根基，蕴含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连辑表示，如何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各国实际发展情况相结合，坚持和平发展与互利共赢的原则不动摇，切实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在座各位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强调，人类文明多样性

是人类进步的源泉，希望与会学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共同为人类进步、世界和平，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力量。

樊丽明代表大会主承办单位山东大学，对莅临大会的嘉宾表示诚挚欢迎和由衷感谢。她介绍了山大在人文学术领域取得的成就，以及近年来在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方面的举措，表示学校将把中国古典学术作为冲击世界一流水平的核心学科领域予以重点建设，开启弘扬儒学研究传统、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新征程。樊丽明表示，本次大会对推动山东大学打造传统文化学术高地，建设“世界文明复兴的东方中心”和“儒学研究重镇”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期待本次大会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构建世界文化新秩序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我们愿与有识之士一道，继续承担时代使命，成为儒学与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和践行者。

杜维明在致辞中表示，儒学已经进入第三期的发展；最近二十年来，大陆儒学研究展现了新的气象，在经世致用、训诂考证、整理国故等各方面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趋势。他认为，儒学应该在更宽广、更全面、更坚实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在更全面和深入的人文关怀中进行；要放眼世界，应该突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能够为世界作出贡献的思想资源，通过文明对话与世界接轨；要批判地认识，不断深化儒家传统中的自我反思能力，在这一基础上建立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杜维明对山东省在儒家文化研究传播中的举措和山东大学在此次大会中的学术影响力和感召力表示赞赏，他相信此次大会将推动儒学研究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孔垂长表示，此次大会的主题具有很强的

现实意义，儒家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多元文化更应该“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他指出，在儒家理想的大同世界，礼乐文化是其重要标志和主要手段，孔子把礼乐作为其教学实践和思想体系的最重要内容，在儒家文化的语境中，礼乐教化成为个人修为提升、社会和谐进步的主要手段。以儒家文化解决工业文明带来的副作用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也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孔垂长表示，在保留礼乐文化精髓前提下，将传统儒家礼乐依循“大乐必易，大礼必简”的原则进行创新，再注入时代元素，适应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才能使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力，才能广泛地推广普及，在增强民众仪式感和文化自信心的同时，起到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

开幕式上，举行了2017年度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授牌仪式。季缙绮宣读了2017年度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名单，根据《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推选章程》，经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推选委员会评选，台湾东南大学教授蔡仁厚先生、武汉大学教授郭齐勇先生获评“2017年度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王胜俊、刘家义为蔡仁厚先生、郭齐勇先生颁发纪念牌。蔡仁厚先生、郭齐勇先生分别发表获奖感言。蔡仁厚先生对获此殊荣感到光荣，认为自己应更加努力，他强调了儒家礼乐教化的重要性，希望儒家的礼教文化能够发扬光大。郭齐勇先生表示将把此次获奖当作对自己最大的鼓励，他感谢自己的师长亲友对自己的关怀和帮助，表示自己将活到老学到老修身到老，同时尽可能帮助年轻学者，希望更多的年轻学者致力于推动乡村儒学、社区儒学等的发展。

来自全球五大洲34个国家和地区、100多个儒学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的近三百位专家学

者，以及各承办单位和曲阜市有关人士、海内外新闻界的媒体记者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前举行了音乐会，来自山东大学艺术学院和山东省歌舞剧院的表演团队为现场嘉宾演绎了优雅的《尼山圣诞曲》和《孔子颂》。音乐会后，伴随着历届世界儒学大会的视频回放，现场播放了世界儒学大会会歌《文明足迹》。

世界儒学大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山东省文化厅、山东大学、中国哲学史学会、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济宁市人民政府、孔子研究院等单位共同承办。其宗旨是主导、推动各国各地区的儒学研究与发展，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促进人类社会的和平、和谐与进步。大会从2008年开始，已成功举办过七届。本届大会在设立主题演讲、圆桌论坛的基础上，还设立了儒学与乡村建设、少儿读经利弊得失之检讨、儒家思想与中医药文化等三个专题论坛，并发布近两年儒学研究十大热点。

“孔子文化奖”自第二届世界儒学大会开始设立，已先后有杜维明、庞朴、汤一介、汤恩佳、李学勤、牟钟鉴、安乐哲、陈来、董金裕等9位为儒学研究传播作出卓越贡献的杰出人士和中国孔子基金会、国际儒学联合会、韩国成均馆等3家机构获得“孔子文化奖”殊荣。依据国家文化庆典规范，自本届起，“孔子文化奖”更名为“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 “金砖国家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由华侨大学主办，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承办的“金砖国家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6月24日在华侨大学厦门校区举行，论坛聚焦金砖国家与全球治理、金砖国家发展与合作、金砖国家与“一带一路”等议题展开研讨。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南非、巴西、丹麦、印度尼西亚、乌干达等十余个国家，以及我国相关部委、高校、智库、媒体代表等百余人参加了为期两天的研

讨和交流，华侨大学副校长曾路教授主持了开幕式。

美国麻省大学 Timothy Shaw 教授，俄罗斯金砖国家研究会执行主席 Georgy Toloraya，巴西中国研究与商务中心执行长 Ronnie Lins，丹麦奥尔堡大学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李彤教授，印度孟买思想学院执行长 Raosaheb G.Bawaskar，印度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谢刚教授，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首席研究

员 Vladimir Petrovskiy, 巴西布拉瓦基金会研究员 Henrique Krigner, 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郝叶力少将, 中联部研究室主任、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秘书长栾建章以及华侨大学校长贾益民教授等出席会议。

华侨大学校长贾益民在致辞中指出, 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国家间的区域合作平台与机制, 在全球的影响力正日益壮大。目前的中国正在履行一个全球性大国的责任, 以补充和丰富全球治理体系, 推动治理体系和国家秩序向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但全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单独应对, 金砖国家之间需要进一步携手合作, 形成更大合力, 作出更大贡献。贾益民表示, 作为立足厦门办学, 以“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为办学方针的高校, 华侨大学致力加强高水平智库建设, 积极搭建金砖国家学术交流平台, 为金砖国家合作提供智力支持和政策建议。同时, 希望以厦门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学校科学研究、智库建设等方面的发展。他称, 此次研讨会将为金砖国家智库间交流合作、互学互鉴提供良好的契机, 必将极大地促进金砖国家智库质量、专业能力、公信力和影响力的提升。

研讨会还特邀郝叶力和 Timothy Shaw 教授分别作了题为“共生 共和 共治 共赢: 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四块基石”、“金砖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竞争力与日俱增”的主旨演讲。

郝叶力在发言中说, “构建网络新秩序是世界各国的历史责任和共同担当, 新型大国关系是和平稳定的基石, 金砖五国应该做参与者, 和平安全的倡议者和引领者, 既要努力构建好新型大国关系, 同时也要与发展中国家一道共同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变革, 让网络空

间成为促进各国共生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她提出, “共生的价值观”解决的是治理理念的问题, “共同的安全观”解决的是治理路径的问题, “共商的治理观”是由谁主导的问题, “共赢的发展观”解决的是如何治理的问题。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完整的治理链条, 也是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抓手, 更是未来网络空间新秩序借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厦的根本支撑。

Timothy Shaw 教授在发言中说, 金砖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竞争力与日俱增。现在的全球治理和过去相比有很多变化, 中国和印度等国家为更加可持续的全球化和本世纪多级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本次金砖智库的会议也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召开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欧盟、日本、美国和英国等传统经济中心的衰弱, 一些新兴国家、智库的兴起, 显示出在全球治理方面合作变得格外重要。Timothy Shaw 表示, 本次研讨会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进一步分析全球挑战的问题, 进而寻求新的合作方式。他认为, 金砖国家的政策在可见的未来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特别是中国、印度等国家在新兴国家中将发挥非常重要的领跑者作用, 共同打造新的国际秩序。演讲最后, Timothy Shaw 强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非常有意义的, 大家应认真对待, 思考这个倡议背后带来的机遇。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 “2017 中国传播论坛暨金砖国家传媒国际研讨会”举行

适逢金砖国家第九次会晤在厦门召开之际，“2017 中国传播论坛暨金砖国家传媒国际研讨会”于 2017 年 8 月 26 日在厦门大学举行。来自金砖五国以及芬兰、英国、土耳其等国的传媒学者约八十人齐聚一堂，就“一带一路”背景下金砖国家传媒的发展及其对国际传播秩序的挑战，进行了深入研讨，取得了广泛共识。

开幕式由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黄合水主持，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胡正荣、厦门大学副校长詹心丽先后致辞，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对会议议题的切实性、重要性和创新性表示高度肯定。

主旨发言由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林升栋副院长主持。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胡正荣教授分析了中国全球传播的三个阶段以及主体、系统、地域、范围等六个方面的变化，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成为中国全球传播的精神核心。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黄合水教授以“金砖国家媒体发展拥有广阔未来”为题，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类的三大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感受外界信息和活动身心的感动需要）此消彼长，金砖国家先后不同程度地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发展进入信息社会，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的满足都变得越来越容易，满足感动需要的时间却变得越来越长，将越来

越依赖媒体的发展来满足。

芬兰坦佩雷大学 Kaarle Nordenstreng 教授简要回顾了二战之后的国际传播史，提出金砖国家的崛起让我们重拾后殖民主义传统和重视非西方文明，从而迈向一个去西方化的世界。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 Daya Thussu 教授则聚焦于“一带一路”倡议与金砖国家的关系，提出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预示了一个新的全球化的到来。

主题论坛由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李展副教授主持，围绕“金砖国家的传媒研究”展开。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 Raquel Paiva 教授首先介绍了巴西媒介产业的现状和变迁趋势，分析了新闻业面临的问题以及背后的经济和政治原因。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Dmitrii Gavra 教授指出，在世界面临多种问题的当下，我们需要回归国际关系的辩证法，而金砖国家需要主动应对网络时代各种权力和权威的倒置，做好战略传播。

印度海德拉巴大学副校长 B.P. Sanjay 教授梳理了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的历史遗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金砖国家传媒业需要多边或双边的多层面合作，才能对国际传播秩序的变迁产生影响。

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姬德

强副研究员则聚焦于中国特色的“媒介融合”概念，从神话、政治议程和市场策略三个维度，揭示了中国传媒发展的“复线”逻辑。

南非开普敦大学 Herman Wasserman 教授介绍了中非媒体关系的研究项目和成果，提出在非洲媒体市场，中国媒体的影响力虽然在上升，但对当地记者和民众的影响力仍非常有限，核心问题不在接触和使用，而是已经形成的刻板偏见，而对非洲的正面报道也许可以改变这一现实。

香港浸会大学 Colin Sparks 教授阐释了比较媒介制度研究的理论框架，指出对金砖国家和“一带一路”国家而言，这一理论需要增加市场等多个维度，才可以具有解释力。

当日下午的平行分论坛共有九个，分别聚焦于金砖国家的传媒发展，金砖国家传媒与国际传播的地缘政治，中国、巴西与俄罗斯的传媒发展，金砖国家媒体与“一带一路”倡议，国际传播的理论创新，中国发展的全球性与地方性，“一带一路”的国际媒体认知，以及“一带一路”与国际传播等多个议题。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龙耘教授、张磊研究员、周亭研究员、李继东研究员、王润珏副研究员等分别主持和点评了相关分论坛，中国传媒大学吴敏苏教授、荆学民教授、张艳秋教授、龙小农教授、吴炜华教授、赵瑞琦教授、贾乐蓉副教授、朱振明副教授、谢飞副教

授，以及来自新华社、厦门大学、香港浸会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瑞士卢加诺大学、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厦门理工大学、澳门科技大学、西南大学和湖北大学等国内外高校和媒体机构的资深专家和青年学者，分别宣读了论文，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对话。

闭幕式上，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龙耘教授指出，本次会议的举行让我们看到了金砖国家传媒研究的巨大潜力及其对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贡献。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李展副教授认为，国际学者间更多的接触与对话，才能产生深刻的理解，建立更牢固的信任，基于此，金砖国家传媒研究才可以越走越远。

“2017 中国传播论坛暨金砖国家传媒国际研讨会”由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和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主办，芬兰坦佩雷大学、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印度海德拉巴大学和南非开普敦大学联合协办，芬兰科学院金砖国家传媒研究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智库联合体提供特别支持。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 第八届中日韩青年论坛举行

2017年8月30日，第八届中日韩青年论坛开幕式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由中国联合国协会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承办。中日韩三国联协负责人、北外副校长闫国华以及来自中日韩三十多所高校的百名学子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由中国联协副会长兼总干事张丹主持。

中国联协会长卢树民对北外承办此次论坛表示感谢，他表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中韩建交25周年之际，举办青年论坛对于三国关系的友好、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日本联协副会长明石康、韩国联协副会长及首席执行官李浩镇、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会长朴铉吉分别发言，认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日韩三国在东亚和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鼓励三国青年人集思广益，为建设更和平、理性和繁荣的世界提出创造性和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闫国华感谢中国联协对北外工作的肯定和信任。他表示，“小语种”可以推动“大外交”，北外在学生培养中秉持“语言+专业化+国际化”的思路，鼓励同学们做全球化时代具有专业语言文化交流能力的多语言者。

北外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永辉对中国联协和学校对国关学院的信任与支持表示感谢。国关学院一向关注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成立了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此次论坛也将助

力青年学子们对国际事务的学习和参与。

在为期三天的讨论中，百名来自中日韩的优秀青年大学生代表就国际热点问题展开讨论：采用模拟联合国会议的形式，讨论“预防武装冲突和难民危机”问题；通过青年研讨会的形式，就“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文化对话促进和平与发展”“中日韩三国在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合作”等三个议题进行了分组研讨。

“中日韩青年论坛”是中日韩联合国协会会长三边会议的平行活动，旨在推动三国青年学生之间的对话，促进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热点问题上的交流，增进相互沟通和理解，为三国未来关系的发展奠定民间基础。该论坛自2010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了七届，吸引了来自中日韩各大高校学生的积极参与。其中，中方曾于2011年在四川大学和2014年在西北工业大学分别举办了第二届和第五届论坛。

本届中日韩青年论坛活动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新华社、中国教育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晨报、央广网等媒体进行了报道。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 “全球史与中国 2017”学术系列讲座 第一讲至第八讲举行

2017年3月至6月，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与全球史研究院联合举办了8场以“全球史与中国 2017”为主题的学术系列讲座，分别邀请了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中清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原明史研究室主任万明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王立新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王希教授，德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德国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德方院长培高德（Cord Eberspächer）教授，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原校长腊碧士（Alfons Labisch）教授，关西大学文学部名誉教授、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亚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松浦章（Matsuura Akira）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刘迎胜教授等8位国内外知名教授做了学术报告。

## 第一讲

3月10日，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中清教授作了题为“中国精英教育四阶段论：1865—2014”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李雪涛教授主持。

李中清教授指出，这项研究的动机一方面是我们了解中国社会通过标准化考试选拔出来的精英与政治和财富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了解中国历史与当下精英社会的情况。李教授通过大

数据分析了从1865年到2014年由中国社会变化所引起的精英阶层的结构转变，并通过收集来自国内重点高校学生的入学登记信息来研究他们的家庭背景、出生地域等情况。李教授最后从全球的视角出发，运用数据统计和分析的方式，从对比中西方精英教育的差异角度审视和分析中国社会，并得出了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李中清教授运用了大量的图表和数据，不仅直观而清晰，而且还提供了一种研究人文科学的新思路和新方法。讲座结束后，现场师生对李教授运用大数据研究人文科学的方法表现出浓厚兴趣，纷纷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与李中清教授进行了互动。

讲座的部分内容，李中清教授曾在《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49—2002》（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一书中予以更深入的论述。讲座前，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会见了李中清教授。

## 第二讲

3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原明史研究室主任万明教授作了题为“白银货币化：明朝中国与全球的互动”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全球史研究院柳若梅教授主持。

万明教授认为，从明初的禁用金银交易，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再到主币的货币化进程，是历史上一个极不寻常的现象。沿着一条白

银货币化—市场扩大发展—与世界连接的道路，明代中国以社会自身发展需求为依托，依靠社会内部的驱动力，拉动了外银的大量流入，并深刻影响了社会的变迁、国家的转型和全球化开端时期中国与全球互动的历史进程。

万明教授首先提出明代“白银货币化”这一概念的五个要点，随后梳理了明代白银货币化发展的四个阶段。讲座的主体部分围绕五个方面具体展开。分别为：第一，从427件徽州土地契约文书看白银货币化过程；第二，从国计与民生两条线索看白银货币化；第三，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第四，从白银货币化看中国与全球的互动过程；第五，白银货币化与国家财政体系变革。

万明教授为师生们展示了若干由原典或原始材料出发所做的个案研究。如从427件徽州土地契约文书的研究中，得出白银货币化并非国家法令推行的结果，而是来自市场的萌发。此外，她还以盗银为例，分析了全球经济体系空间在初步建构中的中国因素；以《明代〈万历会计录〉的整理与研究》一书为例，阐述了中国古代财政体系如何从以实物与力役为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全面转型，从而标志着中国从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

从宏观与微观的多个角度分别对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进程进行以上说明之后，万明教授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明代白银货币化成为开启近代中国的重要坐标。第二，明代白银货币化使得中国与全球化接轨。明代中国曾积极参与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为一个全球新时代的出现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另外，白银货币化中的明代中国在与全球互动的过程中，在不同时期对彼此形成了复杂的积极或消极影响。

最后，万明教授也表示自己的研究还存在遗

留问题，比如性别史对白银货币化的影响以及明代白银货币化对清朝的具体影响等问题，还留待今后继续开拓。

讲座结束后，现场的教师和同学们仍然意犹未尽，继续就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若干衍生问题与万明教授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 第三讲

4月19日，北京大学历史系王立新教授作了题为“‘西方’是如何被发明的？——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与大西洋同盟的构建”的学术讲座。全校百余名师生聆听了讲座，并与王立新教授进行了热烈讨论。讲座由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李雪涛教授主持。

王立新教授首先分析了“西方”的概念。他认为，不同国家理解的西方有不同的含义。从地理意义上讲，“西方”包括西欧、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文化和政治意义上讲，“西方”是美国领导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共同体（大西洋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并不是自古就存在的，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被塑造的。

王立新教授以“克雷弗可之问：我们（美国人）是谁”为引子，探讨了美国国家身份构建的过程。国家身份是“想象出来的自我”，是社会和文化建构的产物。国家身份的建构性质决定了国家身份并非是静止的，而是变化的。一个国家会根据自身的变化、环境的需要和不同“他者”的出现对“自我”进行重塑，从而使国家身份发生改变。作为一个没有统一的族群特性，缺乏悠久的历史传统而又以反叛的方式进入国际社会中的国家，“我们是谁”、“我们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是美国经常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美国大学“西方文明”课程的开设，也推动了“西方文明”话语的构建。“西

方文明”的成就和独特贡献包括民主制度、法治、个人自由、普遍人权的观念、科学和技术发明、宗教宽容等。美国在构建自身身份的过程中，极力强调例外主义，特别是与欧洲的差异性，突出大陆主义与欧美之间的对立。对外则强调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独特性（Uniqueness），它决定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地位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全球地位的提升，特别是“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使美国成为拯救西方文明的核心区。二战以后，跨越大西洋地域空间的“大西洋同盟（Atlantic Alliance）”逐步构建完成。

全球史研究院顾彬教授对讲座进行了简单的评议，发表了自己对相关问题的见解，与王立新教授进行了讨论与交流，现场师生还就美国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与王教授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 第四讲

4月26日，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希作了题为“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李雪涛教授主持。

王希教授主要介绍了美国历史学界的最新研究趋势。他首先对世界史和全球史概念的区分和联系做了说明。国内历史学界通常用两个概念——“中国史”、“世界史”——来对历史学科做大致的分类。中国史似乎没有太多的歧义，凡是中国“内部”的历史都属于中国史的范畴，中国以外的历史（国别史、地区史等）就属于“世界史”的范畴了。国内很多大学的历史学系都是这样划分的，人才培养、学位计划的设定也都是按这个思路。国家颁布的一级、二级学科的分类使用的也是这样的概念。仔细分析起来，这样的划分是有问题的，好像世界中没有中国，中国不

属于世界一样，缺乏一以贯之的理论框架来把世界各国的历史和中国历史连贯起来。所以，世界史应该如何教，教材应该如何写，世界史的教学应不应该包括中国史，都是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的问题。这种情况在美国同样存在。相对于世界史，美国史的研究无论在研究人数和大学里的科系划分都处于绝对的优势。

这种划分以国家史（National History）为底线，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历史研究的规范，是一种人为的政治建构，即便是对世界史的研究也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看世界的视角受国家史的影响。因此，各个国家的历史都显得很特别，强调自己的历史经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历，不同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一般经验。但对于什么是世界历史的普遍经验和规律，全世界历史学家并没有共识。冷战结束后，全球史开始兴起，成为全世界历史学家关注的研究方向。国内像北京外国语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都建立了全球史的研究机构，美国哈佛大学也作出了转向全球史研究的尝试。

在全球史成为关注点之前，美国史学界在1960年代之后把外交史逐步转变成对外关系史，扩展了外交史的内容，后又改成国际史、跨国史。哈佛大学日裔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曾对国际史、跨国史和全球史做出定义，从他的定义中可以窥见全球史概念的由来，即从外交史到对外关系史到国际史到跨国史再到全球史，学者的研究在一步步扩大。

全球史和世界史的区别在哪里，他们之间是否有共通和重叠的地方？研究的范围、主题、材料和方法上有什么不同？全球史是不是包括了被传统世界史和国别史排除在外的环境、疾病、气候、生态、地址、自然等等内容？

全球史成为一个热门的领域与全球化的进

程之间关系密切。全球化的进程从地理大发现就开始了，但其发展的过程被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所节制。如果把过去五百年的历史重新划分，王希教授认为可划分为两个阶段，1490年—1790年是全球化进程中帝国争霸的时代；1790年—1990年是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时代。这两个阶段催生了权力以及保证权力长期性和永久性的保障机制。“国家”被发明，成为保障权力稳定的基础，作为一个组织和获取资源的工具，这是基于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全球化进程。在过去20年出现的全球化进程不同于之前，是带有全球关怀的，国家利益已不是唯一的驱动力。

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是美国学界内部自我反思的结果。国际化提出要在美国史研究的思想、主题、材料、内容等方面跳出国家史的窠臼，将美国史的研究放在一个更大的世界性的或全球性的背景之下去研究。研究者不是只局限于美国学者本身，也包括非美国的美国史研究者，可以给美国史带来新的视角和新的解读，改变美国人对本国历史的认知，从而认识到世界和美国间的密切关系，并培养具有全球思维的世界公民。

全球史的研究不仅是一种方法论的转向，更是认识论的转向。为什么美国历史学界会提出这种思路？这涉及到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美国一方面是全球化进程的产物，另一方面美国历史一直带有一种美国例外论的色彩，坚守孤立主义。

王希教授对美国史学的发展做了简单回顾，从早期美国的绅士学者到经过专业训练的美国历史学者再到不同学派的出现，都仍然把美国历史看作是国内经验的反映，没有把美国人的历史和世界联系起来。冷战后，多元化的文化和围绕多元主义的辩论迫使美国历史学家开创新的研究模式。史学的碎片化和全球化的现实成为美国史学界把美国历史研究推向国际化的动力。

讲座结束后，现场师生就特朗普当选对美国史学的影响、美国大学的历史学教育等问题与王希教授进行了交流互动。

以下为美国史研究国际化的一些代表性成果：

1. David Armitage,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 Thomas Bender, *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6).

3. Daniel T. Rodgers, *Atlantic Crossings: 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4. Victoria de Grazia, *Irresistible Empire: America's Advance through 20th-Century Europ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5. Mary L. Dudziak, *Cold War Civil Rights: Race and the Image of American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第五讲

5月11日，德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德国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德方院长培高德（Cord Eberspächer）教授作了题为“‘交叉史’概念和如何书写中国与世界相交织的历史”的学术讲座。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李雪涛出席并主持讲座。

培高德教授开篇便提出本次讲座的核心问题：在旧有的资料和方法已经日趋被淘汰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如何在全球化的时代用新的方法、理念和视角书写历史？随后，他用具体例证对几个概念的使用进行了简要梳理，它们分别是：欧洲史（European History）、世界史（the World History）、历史比较（Historical Comparison）、

国际史 (International History)、跨国史 (Transnational History) 等。他指出,随着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趋势,要解决当代极具复杂性的历史研究问题,我们需要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在这一基础上,培高德教授进一步分析了历史学家如何将本国历史与全球历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随后,他提出了本次报告的核心概念——“交叉史”(Histoire Croisée)。在这一历史研究的新视角下,他运用一系列例证强调了“比较(Comparison)”和“联系(Relation)”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正确理解相关概念。培高德教授通过展示原始典籍和档案文献的图像资料,详细讲解了几个典型的中国与世界历史相交织的研究案例,大部分案例均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与世界密切联系的时代相关。

在本次讲座中,培高德教授从问题意识、全球视角和超越贯通的立场出发,运用生动而切实的案例研究和丰富详实的原始文献,为听众逐步构建出一个“交叉史”的历史研究框架,以及如何在这个框架下,从多种视角出发书写和研究中国与世界相交织的历史。他的讲座既有宏观的史学理论和史学观点,又有基于档案文献的个案研究,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良好学养。

讲座结束后,现场师生继续就若干历史研究的相关问题与培高德教授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与探讨。

### 第六讲

5月17日,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原校长腊碧士(Alfons Labisch)教授作了题为“中医与西医:早期的相遇?”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李雪涛教授主持。

腊碧士教授在 Paul U. Unschuld 教授研究的

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研究的两个核心问题:第一,根据现在的研究,存在一种必然的趋势,即不同传统的医学之间在早期存在一种相关性。那么,这种必然趋势是否真实存在,如何解释,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二,根据现在的研究,中医和西医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种情况是否存在,如果存在,传统又是怎么改变的,传统和现代之间有什么区别?

腊碧士教授从全球史的视角,对这两个核心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与古希腊医学、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历程以及核心概念的比较,腊碧士教授认为,从源头开始,中西的医学传统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仍然不同;存在潜在相似性的观点是当下研究的基础;即使是表面的相似性,从实质上来说,也只是偶然的,从内容上来说,中西医的内涵和应用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早期潜在相遇可能性的轨迹,目前是无法进行追溯的。

讲座结束后,现场师生与腊碧士教授就中医和西医、中医本质、医学大数据研究等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全球史研究院特聘专家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泰国国际佛教大学校长魏查理(Charles Willemen)教授,以及来自北京大学、协和医科大学的多位教授参与讲座,并与腊碧士教授展开了深入讨论。

### 第七讲

5月19日,关西大学文学部名誉教授、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亚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松浦章(Matsuura Akira)教授作了题为“前近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全球史研究院柳若梅教授主持。

松浦章教授首先讲述了中国在汉朝时与大秦的交流。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

国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象牙、犀角、玳瑁等礼物（《西域传》）。这是欧洲国家使者访问中国的最早记录。其后正史又载大秦商人来到交趾，此地当有东亚海域的重要港口。

接着，松浦章教授向听众们介绍了东亚各国的传统船只的特点及其海上交流的情况。根据史料的记载，中式帆船与日式帆船的桅杆悬帆位置不同，中式帆船可以获得更大的帆力，航行速度更快。朝鲜向德川幕府派遣的通信使所乘之船与中国船只略有不同。朝鲜有渔船以及海运大米的漕船。而日本遣唐使船以及朱印船贸易所用的荒木船体量大，可适应远海航行。江户时代实行海禁，日本人不得出海远航。弁才船为大型木帆船，是日本近海航行的主要船形。此船促进了日本国内商品经济发展，如产于北海道的海带可以被运送到大阪市场。

随后，松浦章教授重点介绍了江户时代的日本与清朝时期的中国的贸易情况。江户时代，长崎为唯一对华通商口岸。中国船只从江浙沿海出发，抵达长崎。商人中既有官商，又有私商，所乘船只主要为沙船和广船。日本向中国出口的货物主要有铜和海产品。铜为铸币之材，从日本进口铜要比从云南运送铜更便捷。但幕府后来控制铜的出口，江户后期海产品逐渐超过了铜，成为日本的主要出口物。中国主要向日本出口砂糖（由于日本当时无法自制）。这样的日中贸易大约持续到鸦片战争。

最后，松浦章教授指出，明清时期的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也保持着贸易往来，进出口货物种类繁多。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美国等国家的蒸汽船开始在东亚海域从事贸易活动。1875年，日本三菱邮便汽船公司开通了长崎到上海的商路。

讲座结束后，多名来自校内外的同学与松浦

章教授就东亚海域的书籍交流、地名等问题进行提问并展开深入讨论。

## 第八讲

6月12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刘迎胜教授作了题为“丝绸之路起源与发展的中国视角”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李雪涛教授主持。

刘迎胜教授首先从“丝绸之路”概念的起源出发，立足于中外文献，论证了古代汉语中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并不存在这个词汇，而丝绸之路开始的标志应该是中国开始与西部开展有目的的活动和有意识的交往。究其原因，刘教授从地理情况、交通条件方面进行了细致分析，并得出结论：不是因为中国没有跨文化交往的需求，而是中国所处的东亚大陆在远距离知识传播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开展与其他文明中心交流的成本高昂。因此，从中国的视角来分析，丝绸之路的产生根植于人类对遥远文明与更好生活的好奇与向往，根植于中华文明“化不利为有利”的内在驱动力。而中国虽因为种种原因错过了大航海时代的发展契机，但是正是中国的火药及罗盘技术为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刘教授的报告高屋建瓴、缜密细致，从具体问题着眼来论证一个宏大命题，注重史实考证的同时又关照社会现实，考察和利用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最新发现的史料，其研究方法和视野对丝绸之路以及中外交流史的相关研究有着特别的启发意义。报告结束后，现场师生与刘教授进行了互动。

全球史研究院



## 越南本土人类学的研究主题与研究趋势<sup>1</sup>

邵朱帅 / 北京外国语大学 / 巴黎五大人文社会研究院

康敏 /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摘要

本文旨在介绍和评述越南本土人类学的发展与特点，并观察人类学这一西方学科在越南的本土化历程，增进对越南社会的认识。作者通过探讨族群、乡村、社会发展与城市化、生态环境等四大研究主题来回顾越南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厘清越南本土人类学的发展简史。同时，揭示出越南学界在新世纪面对复杂的全球政治、文明格局时研究旨趣的转向。越南本土人类学的特点还在于，其基于地方社会、文化多样性的研究在拉近地方与国家的距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关键词

越南人类学 民族学 农村研究 社会发展

1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越南人类学发展述评”的研究成果。

东南亚地区因其在地域、语言、文化、族群和宗教上的丰富性和异质性，一向吸引着人类学者的目光。基于东南亚地区田野调查基础上撰写出版的民族志作品硕果累累，且不乏经典之作，例如格尔茨的“剧场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利奇的“山地政治模型”、詹姆斯·斯科特的“日常抵抗”等等，这些研究不仅成为人类学学科史上的里程碑，也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遗憾的是，一直以来，中国学者阅读与思考的民族志作品大多出自西方人类学家之手，这未免使得我们对东南亚地区的了解多多少少受到了西方视角的影响。换句话说，由于缺乏对东南亚本土人类学发展的了解，我们对东南亚社会的理解是不全面的，甚至有可能是歪曲的。本研究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提出的。

越南在东南亚诸国中具有特殊性。首先是它在历史上受到了很深的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其次是自近代以来，它与中国有着相似的革命历程、相近的现代国家体制与语境，并同样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快速发展的阶段。考察越南本土人类学发展的历史和趋势，不仅有助于我们借鉴越南人类学积累的知识成果，增进对越南社会的理解与感知，也有助于我们思考和比较人类学这一具有西方血统的学科在越南和中国的本土化过程。本研究旨在厘清越南本土人类学的发展简史，通过

**从历史上看，越南内部的族群结构极为复杂。本土族群网络不但与越南历史本身有关，又与东南亚族群、中国西南地区（尤其是广西、云南）的少数民族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和流动网络。**

探讨族群、乡村、社会发展与城市化、生态环境等四大研究主题，揭示出越南学界在新世纪面对复杂的全球政治、文明格局时研究旨趣的改变。

越南人类学的源头可追溯至法国殖民政府在越南的国民教育体系。在这一时期，越南人类学如同婴幼儿在法国人类学的引领下蹒跚学步。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越南将人类学学科设置在历史学下，研究主题也多是以历史视角探讨本土社会，尤其是乡村的文化生活、传统习俗、信仰仪式、亲属结构等人类学经典研究领域。越南自1945年“八月革命”以后，尤其1975年南北统一后，无论是出于研究民族地区政策的需要，还是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需要，民族学研究成为越南人类学的主流。这一时期，越南人类学遵循的是苏联模式。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越南人类学走上了独立反思与发展的道路。越南人类学者开始重新梳理西方人类学在研究中所使用的与地方性知识不符的概念与理

论框架，以及少数民族研究中过于国家化的视角，以更为本土的反思视角展开对自我的人类学观察。革新开放以后，越南人类学的研究开始转向应用性更强、更具现代批判意识与当代社会联系更紧密的主题。

## 一、族群研究

从历史上看，越南内部的族群结构极为复杂。本土族群网络不但与越南历史本身有关，又与东南亚族群、中国西南地区（尤其是广西、云南）的少数民族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和流动网络。从1945年“八月革命”后越南北部得到解放，到革新开放，现代国家体系逐渐建立、扩展，越南无论是在经济体系、社会文化还是意识形态、权力结构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一方面经历了社会和文化体系的巨大冲击，被裹挟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除地理上较为偏远外，在经济发展的语境中，这些地区大多被视为“落后”。这种相对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位置使得少数民族成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被广泛关注。

越南北部，特别是红河三角洲以北的山地地区人口分散，族群众多。前现代时期，国家和学界对这些少数民族文化、语言、社会结构的知识十分匮乏。越南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期间，北越共产党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为了战胜法国、美国的殖民与侵略，成立了多个联盟组织以广泛联合不同族

群、宗教力量。与中国类似，越南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活动，民族学、人类学者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越南民族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从1959年越南中央民族委员会第一次公布越南有63个少数民族，到1974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公布有40个少数民族，1978年公布全国有59个少数民族，1979年最后确定为54个民族，<sup>1</sup>期间少数民族群的识别标准和依据一直在变化。

越南社科院的民族学研究所、河内综合大学的民族学工作者与政府相关部门多次召开研讨会专门为此展开讨论。通过民族学工作者广泛的田野调查和历史研究，有关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社会传统、生活方式的民族志材料得到了积累。同时民族学者也开始对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民族识别工作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诸如黄氏珠、阮灵、程洁的《越南对属于不同形成方式的地方集团进行民族识别的一些情况》中，以地方集团来讨论多个族群混居与分离的问题。

越南民族学者认识到民族识别工作所面对的对象是十分复杂的，少数民族群因移民、迁徙，族群聚落形成的历史过程十分悠久，往往是来自多个地方的不同移民群体汇聚在一处。这些地方性的聚落有些处于分化阶段，即便语言相通、习俗与文化相近，但也不认为彼此之间是“同一种人”；有

**越南民族学者认识到民族识别工作所面对的对象是十分复杂的，少数民族群因移民、迁徙，族群聚落形成的历史过程十分悠久，往往是来自多个地方的不同移民群体汇聚在一处。**

些则处于同化过程中，即便从遥远的地方迁徙而来，也逐渐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与当地族群混居共融。因此，民族学工作者不但要进行实地调查，还要做大量的历史研究工作，追溯族群迁移的路线及其起源。然而，这种以少数民族群认同为基础、还原每一个聚落中的少数民族的文化相对性、特殊性的努力并不完全符合团结少数民族的整体语境。尤其是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少数民族裔与多数族裔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更成为一个被给予高度关注的议题。与此类似，越南产生了一些反对将聚居的族群划分为更小单位的声音，认为这种强调少数民族群认同与身份的问题具有危险性。但有部分民族学家坚持认为，必须追溯每一个民族形成的要素，并加以比较，这是民族学家、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主要作用。民族学者黄氏珠、阮灵等就认为在民族识别过程中，民族

学者的研究工作不应囿于国家语境中民族政策和路线方面的决议，只有秉持民族学研究和民族工作研究是不同的任务这一信念，才能保持民族学研究工作的客观性。<sup>2</sup>这些学者认为所谓客观性的民族学研究是指对少数民族群的起源、迁徙、文化、宗教、宇宙观等等整体性的民族志式的研究。此后，越南民族学者继续专注于越南不同族群在历史、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等方面的多样性保护研究，催生了许多题为“……多样性”研究的学术会议。“文化多样性”不仅在学界受到重视，在国家语境中，同样具有政治正确性。但这一将“还原族群特殊性本色”作为客观性研究的反思，也展现了越南社会在文化上的某种焦虑，即“少数民族群的多样性、特殊性”与“一个共同面对现代化进程的整体”之间的张力。越南民族学工作者在这两个研究主题间的纠结也呼应了东南亚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当异质性极强的不同文化、族群形成一个民族—国家以后，如何处理内部多样性与共同迈向现代的问题。

几十年间，民族学者们主要展开了两方面研究：首先，关于越南少数民族群本身历史、文化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第二，国家语境中的越南民族政策、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研究。在这一基础上，越南民族学不但深入研究了有关少数民族群的理论，也在民

1 范宏贵：《越南的民族识别与实践》，载《世界民族》1997年第2期。

2 黄氏珠、阮灵、程洁：《越南对属于不同形成方式的地方集团进行民族识别的一些情况》，载《世界民族》1983年第6期。

族政策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诸如，山地少数民族在经历工业化、都市化发展中遭遇的移民、再定居问题；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跨境族群与周边国家少数民族间的联系；对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评估等等……这些研究在积累了有关少数民族的民族志资料的同时，也成为国家民族政策实践的重要依据。<sup>1</sup>

## 二、乡村研究

越南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有大量的农业人口，即使经历了工业化转型，农业仍在经济系统中有重要意义。<sup>2</sup>“越南文化主要由乡村文化起源演变而来”，<sup>3</sup>乡村在越南历史、文化构建中具有象征意义。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大众想象中，乡村文化都是越南文化独特性的重要标志。19世纪末，在农民起义、反抗殖民运动迭起的背景下，法国殖民政府出于对越南乡村的重视开始进行越南乡村研究。<sup>4</sup>当时仍处于殖民教育体系中的越南学者也被鼓励研究本土传统、习俗，这些研究文章被发表在当时越南的一些重要文化



刊物上。<sup>5</sup>从20世纪以后，西方学者首先开始对越南乡村进行人类学民族志式的基于田野调查的整体社会研究，其中法国学者 Pierre Gourou 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北圻平原的农民》<sup>6</sup>被认为是一部开山之作。该书的研究对象是当时世界上族群最多元的平原地区——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的农民，研究内容包括自然条件、生计方式、家庭结构、宗教信仰等等。正是这一研究开创了越南乡村研究的基本范式，并引起了后来的越南学者对农民群体、农村地

区、山区少数民族农民的广泛关注。

和民族学发展的境况相似，二战以后，1954—1975年之间，北越的独立使得学者的研究旨趣开始转向。这些研究常用回溯历史的眼光审视1945年“八月革命”前的越南乡村社会，包括封建时期和法属时期的土地政策；父权主宰的宗族制度；社会组织结构网络；乡民的共同生活……且往往带有批判性的视角，代表作如 Nguyễn Hồng Phong 的《越南乡村》，<sup>7</sup>该作品被认为是第一部带有马克思主义史观的越南农村研究著作，也成为越南学界长久以来不断阐释、反思的重要文献。南部地区的学者在这一时期则仍接受法国远东学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的学术训练和学脉影响，更加关注南部湄公河三角洲农村地区的文化生活、宗教信仰研究。1975年越南南北统一以后，知识界的隔阂随着地域界限的消失逐渐缓和，而1986年的革新开放则使得田野调查有了更强的可实施性。不论在方法论上还是理论框架上，越南学者终于开始了从内部视角出发的对本土社会多维度的人类学考察。<sup>8</sup>

1 Vương Xuân Tỉnh, “Định hướng phát triển của Viện dân tộc học giai đoạn 2013-2020 và tầm nhìn đến năm 2030”, *Tạp chí Dân tộc học*, 2013(5).

2 根据越南统计局2006年的数据，农业人口占越南总人口的75%，农业在越南GDP中占比20%。

3 “Bùi Xuân Đình, Nhìn Lại Việc nghiên cứu về làng Việt”, *Tạp chí Dân tộc học*, 2013(5).

4 其中具代表性的有 Or Y P., *La commune annamite au Tonkin*, A. Challamel, 1894. “Dumoutier G. Essai sur les Tonkinois, superstitions”, *Revue Indochinoise*, 1908.

5 这些杂志包括 *Nam Phong*《南风》, *Annam Nouveau*《新安南》, *Đông Dương Tạp Chí*《东洋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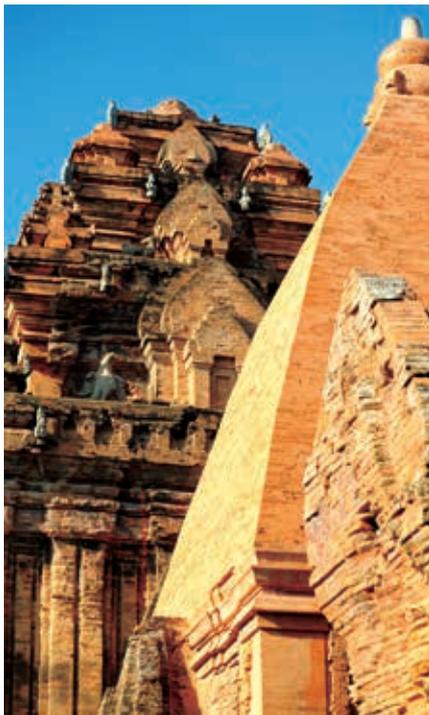
6 Gourou P&Miller R R, *Les paysans du delta tonkinois: étude de géographie humaine*, Mouton, 1965. 虽然 Pierre Gourou 是地理学家，但此书同时包括地理、人文的研究。于2004年在越南翻译再版 Pierre Gourou, *Người nông dân châu thổ Bắc kỳ* NXB Trẻ, 2004.

7 Nguyễn Hồng Phong, *Xã thôn Vietnam*, NXB Văn Sử Địa, 1959.

8 Nhung Tuyet Tran, Anthony Reid (eds), *Viet Nam: borderless histories*, Univ of Wisconsin Press, 2006.

此后的越南人类学的乡村研究又可分为传统乡村社会的研究和新时代背景下乡村的变迁研究。1945年“八月革命”胜利以前，越南乡村还未经现代国家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重大改变，虽有法国殖民时期，但传统乡村的社会、文化生活，尤其是生计方式仍较大程度地维持了原貌。因此早期的越南人类学乡村研究带有历史学的趋向，即研究越南的传统乡村社会。越南第一位在法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学者 Nguyễn Văn Huyền 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在巴黎索邦大学完成的两篇博士论文《安南青年男女的对唱》和《东南亚高脚屋的初步研究》<sup>1</sup> 得到法国学界的肯定，在法出版并翻译成多种语言。他作为越南第一代民族学、人类学工作者，不仅在越南乡村文化研究领域建树颇丰，而且为越南整个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和教育事业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另外极具代表性的优秀作品——Trần Tù 的《越南北部传统乡村的组织结构》<sup>2</sup>，以人类学对社会文化全景式的分析，对越南乡村社会进行了总体性阐释，内容包括传统乡村组织、社会结构、权力秩序、人际网络等。这部作品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其本土视角，



Trần Tù 将“giáp”作为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从文化意义上将其与行政单位“làng”（village）、“xã”（commune）区分开来，将“giáp”这一村庄中男性居民的共同体看作是社会文化、宗教生活中的基本单位。只有从这种以农民群体出发的非政治性的本土视角出发，将政治性的组织单位和文化性的社会单位区分开来，才能逐渐厘清村舍和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sup>3</sup> 这一对自我社会的剖析超越了西方学者的局限，

西方语境中界限分明、固定的政治性单位村庄（village），与公私混合、阶层并不分明的越南乡村社会有着本质性的区别，村庄（village）并不适用于越南乡村社会。这部作品对越南学界长远的影响也正在于此。

此后，越南学界开始了广泛的关于农村社区的人类学研究，主题十分广泛，包括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习俗、宗教信仰，以及不同地区农村社区的不同特点等等。总的来说，乡村文化是越南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重要源头与动力，而越南人类学的乡村研究也为越南社会科学界乃至全球范围内的越南研究积累了重要基础与具有批判性的本土观点。

20世纪末以后，乡村文化传统、秩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变迁，农村研究的主题变得更为丰富和多样，其中传统社会的转型问题成为学者们的首要关注点。可观察的社会、文化生活尤能引起人类学家的兴趣，如深入越南人骨髓的供奉祖先的仪式、婚葬礼俗、庙会、香会等等村舍的共同生活内容被学者认为是越南现代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祖先崇拜被一些学者视为越南民族国家在文化认同上的重要凝聚力，建议国家通过祖先崇

1 Nguyễn Văn Huyền, *Hát đối đáp nam nữ thanh niên ở An Nam*, Nhập môn nghiên cứu nhà sàn ở Đông Nam Á, 1934. 编者注：《安南青年男女的对唱》与《东南亚高脚屋的初步研究》均为作者博士学位论文，前者为主论文，后者为副论文。

2 Trần T, *Cơ cấu tổ chức của làng Việt cổ truyền ở Bắc Bộ*, Khoa học xã hội, 1984. 除本土社会外，Trần Tù 还进行对非洲社会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

3 之后的越南学者开展了更广泛的田野调查研究，证明、发展、反思 Trần Tù 有关越南乡村社会结构的结论性观点，如 Trần Tù 的学生 Bùi Xuân Đình 有关越南传统乡村结构的大量研究 *Hương ước và quản lý làng xã Hà Nộ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1998; *Hành trình về làng Việt cổ Hà Nội*, NXB Từ Điển Bách khoa, Viên Văn hóa, 2008 等。

拜的仪式，如祭奠雄王（被认为是越南人共同的祖先）来加强整个越南民族的向心力。另外，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南学界发展的重要趋势还在于学界和国家层面的合作，国家政府、国外研究机构也参与到研究中来。1992—1997年由法国农业社会科学院与越南多个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合作的“红河平原研究”项目就是代表，其中成果如 Mai Văn Hai, Bùi Xuân Đính 的《水力与乡村关系》<sup>1</sup>通过农民对水源的保护、与水患的抵抗来讨论人与水的复杂互动关系是如何随着历史而变迁的。农村社会变迁的另一大主题——都市化研究，将在下面的章节中叙述。

### 三、社会发展与城市化研究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战火和共产主义集体化、革新开放等多次急遽的社会转型，越南终于踏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革新开放以后，传统的农业化国家进入现代全球化的资本运作网络，<sup>2</sup>经济领域的发展给越南带来了社会阶层、传统观念、人际模式、社会组织等方面的结构性变化。伴随着现代化一同到来的是社会发展问题，尤其当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战火和共产主义集体化、革新开放等多次急遽的社会转型，越南终于踏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革新开放以后，传统的农业化国家进入现代全球化的资本运作网络，经济领域的发展给越南带来了社会阶层、传统观念、人际模式、社会组织等方面的结构性变化。**

国家权力在政治上缺乏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时，这些问题以动荡的方式突显出来，例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因地方政府贪污国家拨给地方的资金引发了越南北部地区普遍的农民抗议事件。<sup>3</sup>发展语境下的地区经济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不平等、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扩张等典型问题都困扰着越南社会。相应的，学界对于社会发展问题也给予了切实的关注，且延伸到多个领域，诸如边境少数民族裔的边贸发展与跨境民族的研究，<sup>4</sup>或讨论特定少数民族群如

何能在文化习俗得以尊重前提下完成生计模式的转变，对政府政策的实施对少数民族的影响进行反思的研究，<sup>5</sup>延续乡村研究的有关后改革（post-reform）时期越南社会转型的研究，等等。意识形态的开放带来的传统社区的复兴（包括宗教、会社、习俗等文化生活的多个维度），与社会本身所处的转型情境之间的张力也成为激发学者研究本土社会的驱动力。<sup>6</sup>

1986年越南实行革新开放以后，越南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逐渐成为发展的中心，城市化、工业化在发展语境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城市化研究也成为越南学界新的研究主题。2009年，越南计划与投资部（Bộ Kế hoạch Đầu tư）进行了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同时出版了调查报告《越南移居与都市化：现状，趋势与特点》，报告显示从1989年到2009年的20年间，越南国内公民移居人口大量增长，但同县市移居人口的比重减少，跨省、跨市移民数量都在2000年以后迅速攀升，其中大量人口向东南部沿海城市转移。除人口模型分析外，报告还考察了越南不同地区的城市化程度及其地方因素，以及人口流动之间的关系。这次调查首次搜

1 Mai Văn Hai, Bùi Xuân Đính, *Thủy lợi và quan hệ làng xã*, Nhà xuất bản Khoa học xã hội, Hà Nội, 1997.

2 1988年越南实行土地改革以后，农民拥有的土地数量上升，中小型农场得到迅速发展。90年代越南便成为稻米出口大国之一。与中国从农业化到工业化的转型不同的是，越南工业化伴随着农业的发展。

3 Carlyle A. Thayer, “Vietnam and the Crisis: The country faced a similarly large challenge before”, *Asia Week*, November 30, 2000.

4 Trần Hồng Thu, “Tác động của kinh tế biên mậu đến các tộc người vùng biên giới Vietnam”, *Tạp chí Dân tộc học*, 2013(3).

5 参见“Trần Thị Hồng yền, “một số vấn đề trong phát triển và xu hướng biến đổi của người Chứt từ đời mới đến đây”; Bùi Xuân Đính, Tạ Thị Tâm, “Một số khía cạnh về chuyên đổi kinh tế-xã hội của người Thổ ở Nghệ An”, *Tạp chí Dân tộc học*, 2013(5).

6 Nhung Tuyet Tran, Anthony Reid (eds), *Việt Nam: Borderless Histories*, Univ of Wisconsin Press, 2006.

集了越南人口流动的确切数据，为之后的定性调查提供了基础数据，各院校与研究机构，不同学科开始了城市主题的研究。2010年，河内国家大学成立了都市研究中心（Trung tâm Nghiên cứu Đô thị）。

同时，越南人类学者也意识到，单纯的农村研究、少数民族研究已经不能如实地反映因人口流动、经济模式转变而带来的乡村与城市的变迁，或者说农村与城市的边界已经因地区发展而变得模糊了，越南人类学应该开展对“复合社会”（xã hội phức hợp）空间的研究。“复合”背后所涵括的意义十分丰富。越南革新开放以后，意识形态上的松绑为社会带来了更多的空间与自由，信仰、宗教、会社等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内容迅速复兴，且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在乡村与城市之间流动。另一方面，在“发展”成为基本社会共识的情境中，农村、城市共同经历了现代性的洗礼，以往的文化模式、观念体系在社会生活中有了不同于传统乡村的、更为复杂的外在形式与内在意义。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文化多样性与社会整体发展的冲撞给了人类学丰富的可观察视点，有学者说“在越南，打开门就看到了研究主题”。<sup>1</sup>事实上，城市研究已经被视作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作城市学（Đô

**人类学一向讲究对某一地区的自然、社会、文化开展整体性与相关性研究。在早期的人类学研究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人类学家将环境生态视作影响当地居民文化习俗、宗教宇宙观的重要因素，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生态人类学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并从简单的环境决定论或极端的文化构建论转变为多维度、多视角地探讨人、文化、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

thị học)。其中《越南城市的过度城市化》<sup>2</sup>是其中质量较高的作品，从居所、移民、城市管理、环境等多个维度讨论了越南城市发展的相关问题，由越、法两国学者共同编辑并在越南出版。

#### 四、生态环境研究

人类学一向讲究对某一地区的自然、社会、文化开展整体性与相关性研究。在早期的人类学研究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人类学家将环境生态视作影响当地居民文化习俗、宗教宇宙观的重要因素，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生态人类学发展成为一个专门

的研究领域，并从简单的环境决定论或极端的文化构建论转变为多维度、多视角地探讨人、文化、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sup>3</sup>越南生态人类学的发展与趋势也与此相对应。

越南生态人类学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5年以后到1986年革新开放。1945年以前，越南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生计方式、社会组织结构基本不为越南主体民族“京族”所了解。前文已经提到，1945年“八月革命”胜利，越南少数民族尤其是北部山区的少数民族积极参与到争取越南反殖民的民族独立战斗中。高山地区的少数族裔与平原地区的多数族裔因共同的战斗有了更多相互了解的机会，国家也十分重视提高少数民族的政治、社会地位。这一阶段的生态研究与越南少数民族研究是合流的。从自然环境来看，越南北部山区与红河平原的地理环境差异较大，因此一些山地居民的生活模式在平原人看来还处在较“原始”的阶段。在生态人类学的环境决定论语境中，某一地区的文化特征，包括技术、居所、信仰、仪式等都是适应自然的结果，正是在这一适应过程中，人类积累了感知和解释外部世界的方式——文化。此类关于特定少数民族自然—文化的研究十分丰富，具有代表性的早期作品有：讨论不同族群在不同的土地环境中不同的耕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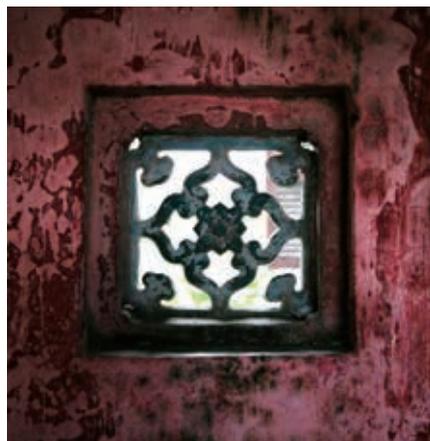
1 Quảng Đại Tuyên, “Bối cảnh đô thị hóa: Vấn đề nghiên cứu nhân học ở Việt Nam, 2013”, *Tạp chí khoa học*, 2013(4).

2 Nguyễn Thị Thiêng, Phạm Thuý Hương, Gubry Patrick, Castiglioni Franck, Cusset Jean-Michel, *Đô thị Việt Nam trong thời kì quá độ*, NXB: Hà Nội Thế Giới, 2006.

3 Kottak C P, “The new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99(1).

方式与文化的《森林与山区民族》<sup>1</sup>；叙述山地族群芒族 (Người Mường) 的梯田耕作与“山”在其社会空间中的象征意义的《芒人与山丘》<sup>2</sup>……总之，将自然生态因素纳入到对少数民族整体社会文化考察中，是此一时期越南人类学的重要特点。正因此，少数民族不同于主流族群的生计模式、文化传统得到了知识界、主流社会的更多理解与尊重。但同时，这些早期作品也有其时代局限，少数作品中仍带有文化单线进化论的色彩，认为少数民族的“落后发展”归因于没有遵循当地的生态环境。<sup>3</sup>

革新开放以后，越南人类学的生态研究也步入了新的阶段。研究对象更为广泛，都市空间的生态问题也被纳入；研究主题随时代更替，从环境与文化的二元关系转向环境保护、文化自然整体性的生态空间保护、地方性知识在生态保护中的运用等等；研究方法与范围更多样，将比较研究、定量统计等方法与传统的民族志方法相结合，将政治、经济等多个维度联系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讨论中。其中



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问题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人类学家强调除国家政策以外，地方性知识同样应该在以保护生态环境、尊重当地文化传统、生计方式为前提的农业发展中发挥作用。<sup>4</sup> 农业发展的市场化，自然资源（尤其是土地）的国家化如果不遵循地方风俗与组织结构将很可能引起地方社区的动荡。<sup>5</sup> 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自然崇拜、泛灵信仰的宇宙观通过宗教仪式强化自然与人的联结，长久以来在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作用。<sup>6</sup> 除农

业发展造成的生态问题、国家政策与当地社区的冲突以外，因工业化、城市化过速导致的对森林资源的滥砍滥伐、环境污染、居民健康问题也引起人类学家的共同关注。在这一层面上，人类学家成为国家与地方对话的桥梁。越南社会科学院的民族学研究所下属的《民族学杂志》在2011年至2012年间出版了六期以“越南森林资源的共同管理”为题的专刊，集中讨论了森林资源政策的实施以及自然森林资源、地方居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人类学学者的基本观点是，国家应当还原当地居民作为自然资源的保护者与使用者的主体地位，保障其在自然资源使用与政策参与中的公民权益。此外，全球化背景下的气候问题研究和国际政治背景下的海洋人类学研究都是越南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族群研究、乡村研究、社会发展与城市化研究和生态环境研究等四大主题并不是完全孤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它们之间有连续的历史脉络，即本土人类学的研

1 Nguyễn Văn Phụng, “Rừng và các dân tộc miền núi”, *Tạp san dân tộc*, 1960(16).

2 Trần Từ, “Người Mường Lương Sơn”, *Tạp chí Dân tộc học*, 1986(3).

3 Nguyễn Thẩm Thu Hà, Nguyễn Công Thảo, Phạm Thị cảm vân, Nhân học sinh thái ở Việt Nam, “Hai giai đoạn, một chặng đường”, *Tạp chí Dân tộc học*, 2013(3).

4 如 Lê Văn Hạ 的《越南北部山区的森林阶梯系统》, Lê Văn Hạ, “Hệ thống ruộng bậc thang trong môi trường miền núi phía Bắc Việt Nam”, *Tạp chí Dân tộc học*, 1997(3).

5 Hoàng cầm 的《森林滥伐：越南西北部盆地的国家资源政策，市场经济，生存竞争与自然意义》，*làm “lâm tặc”: Chính sách tài nguyên của Nhà nước, kinh tế thị trường, sự tranh giành mưu sinh và ý nghĩa tự nhiên ở một thung lũng vùng Tây Bắc Việt Nam*. Trung tâm nghiên cứu Tài nguyên và môi trường – Đại học Quốc gia Hà Nội, NXB Khoa học và Kỹ thuật, Hà Nội, 2008. 再如 Khoa V N, Thao N G, van der Geest K, *Rainfall, Food Security, and Human Mobility: Case Study Viet Nam*,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2012.

6 如后江省 (Hậu Giang) 的侬族 (người Nùng) 于每年的1月30日在林禁区举行供奉仪式以表达对森林、水源的敬意。Vương Xuân Tình, *Luật tục của dân tộc Tày-Nùng với vấn đề bảo vệ xã hội và nguồn tài nguyên* (《岱—侬族的俗律和资源与社会保护问题》), trong *Luật tục và phát triển nông thôn hiện nay ở Việt Nam* (《越南农村俗律与当前的农村发展》), NXB Chính trị quốc gia, Hà Nội, 2000.

究旨趣与立场总是与其所处的本土社会的发展、挑战息息相关，人类学者对“自我”社会的观察总是出于对现实社会症结的切实关怀。除此之外，越南人类学在其他人类学分支领域也产生了十分丰富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宗教人类学、文化研究等传统研究分支。但限于篇幅我们在此不作讨论。

## 五、讨论与思考

当我们回顾越南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将学术脉络放到历史性的视角中时，也许能看到一些中国人类学的影子。作为和中国同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人类学这一带有“西方”基因的、与全球化伴生的现代学科在越南和中国的命运更多地与现时代本土性和民族性—地方性相勾连。同时，我们也能体会到人类学秉持的文化多样性、特殊性的基本学科精神对缓解越南民族整体性的文化认同焦虑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可否认，越南民族文化尤其是越南北部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十分复杂的互动关系，在肯定越南作为一个文明主体拥有丰富的内在异质性与能动性的同时，也无须故意忽视其在政治结构、儒家传统上受到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在越南民族从殖民情境中解脱出来以后，其社会整体经历了多次“去中国化”以强调“越南民族性”。这一过程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越南民族”的文化认同危机。人类学对本土社会的研究、对本土社会地方性知识的积累有效地缓解了这种

**当我们回顾越南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将学术脉络放到历史性的视角中时，也许能看到一些中国人类学的影子。**

焦虑。这对越南整个知识界、思想界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越南社会对本土文化、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上的共识与人类学的价值观念合流。因此，人类学也可以在国家政策制定中占有一定的话语权。

另一方面，越南文化本身有着极强的异质性，来自东南亚地区、中国的少数民族在这里不断迁徙、繁衍使得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聚居情况极其复杂，同时长达几十年的南北隔阂也增强了社会整体的多元性。从学术上探讨越南内部的文化多样性与实践中的文化政策有着密切的关联。尤为值得称道的是，越南人类学界在这一问题上有着很高的参与度，拉近民间与国家政策制定之间的距离是其重要使命。诸如笔者于2014年参加了由越南宗教局官员、宗教界人士、人类学者共同参与的题为“越南宗教文化多样性——理论与实践”的讨论会议。会上人类学者从学理上阐述越南外来宗教、本土宗教、新兴宗教的复杂多样性；宗教人士则从教内观点出发，表达了希望不同宗教都应该得到平等对待的诉求；政府官员则阐述国家宗教

政策的制定方向与原因。虽然三者之间存有分歧，但都坚持文化多样性需要被保护与尊重的基本观点。越南人类学在地方与国家之间起到的桥梁作用、学术研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许正是中国人类学需要学习的方面。

越南人类学的另一大特点还在于，跨学科、跨国家研究程度较深。在跨学科研究方面，虽然设有专门的人类学专业的院校数量并不是那么多，但许多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都结合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一些在当代社会情境下产生的新研究领域，如城市研究（越南称为“城市学”），研究生态空间的“生态学”（*Sinh thái học*）都大量运用了人类学的研究视角、理论以及实地考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我们很难将人类学从这些研究中割离出来。另外，在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上，革新开放以后越南人类学越来越多地与国外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研究项目、学术研讨会，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综上，本文将越南人类学的发展与越南本土社会的现代进程结合论述。越南人类学有着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人类学的相似点，往往伴随着本土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但在具体的研究主题的转向、研究领域的关注上，越南人类学都受本土文化传统与情境的影响。希望对越南人类学发展脉络的考察有助于增进我们对越南人类学界、越南近代社会的理解，同时对中国人类学界有些反思意义。



## 印度高等教育“保留政策”及其启示<sup>1</sup>

李茂林 /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宣传部

### 摘要

印度高等教育的“保留政策”一直在印度高等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争议不断。通过对印度高等教育“保留政策”的背景、历史、作用及问题进行分析，希望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入学政策有所借鉴。

### 关键词

印度 高等教育 保留政策 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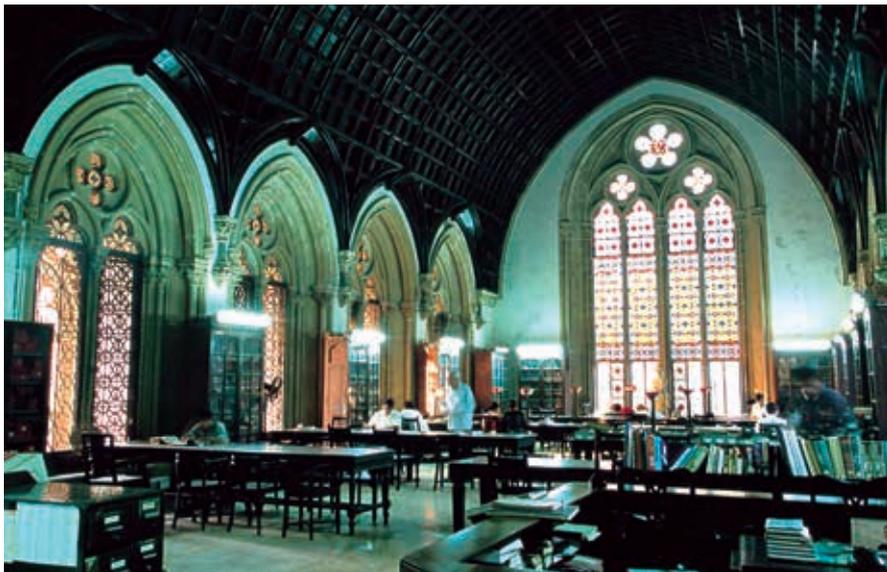
1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印度高等教育入学保障政策研究及启示”的研究成果。

## 一、印度高等教育“保留政策”产生的背景

独立近 70 年，印度高等教育已经形成完备的体系。多所印度高校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为印度培养了大量高水准的科技、管理和人文人才。当前，印度拥有庞大的高等教育规模，紧随中国、美国之后，位居世界第三。但同时，印度高等教育也存在着突出的问题，种姓制度中的“贱民”入学问题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印度贱民主要包括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1935 年，《印度政府法案》将“贱民”种姓用单独的表格列出来，以便在议会选举中为他们保留席位，贱民由此获得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称号。当前，印度的贱民数量庞大，总数量接近 2 亿，占到了印度人口总数的 1/5。80% 的印度贱民生活在农村地区，其余 20% 生活在城镇。<sup>1</sup> 这些“贱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就成了印度教育中最突出的事项之一。

自 20 世纪初，印度政府就开始提出并实施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保留政策”（Reservation Policy）。这是政府保障“贱民”阶层的一项优惠政策，即为其在高校中保留一定份额，以保证他们的入学权益。从后来发展看，这一政策确实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贱民”阶层在教育、经济和政治上的劣势地位，促进了印度国民经济的整体



发展。但“保留政策”的发展动力及困扰多来自政治斗争和利益博弈，加之“保留政策”自身的缺陷，使得多年来该政策一直成为印度社会和民众争执和持续关注的焦点。

## 二、印度高等教育“保留政策”的发展历史

萌芽期（20 世纪初至印度独立前）。英印政府为缓解种姓制度造成的社会动荡，开始实施提高贱民群体地位的相关政策，并在高等教育入学领域采取相应政策倾斜。1918 年，迈索尔邦宣布在大学和机关中为低种姓群体保留席位并规定名额。这标志着印度高等教育“保留政策”的开始。

探索期（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

代）。独立后的印度政府为处于社会底层长期受压迫、受歧视的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分别保留了 15% 和 7.5% 的高校入学名额，后来又为“其他落后阶级”保留了 27% 的入学名额。根据这个政策，这些弱势群体在参加高校入学考试时，将获得优先录取的机会。<sup>2</sup> 1977 年，人民党上台后，成立了落后阶级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印度最好的精英大学——印度理工学院、印度商学院和印度医学院及其他中央大学均需为“贱民”阶层保留相同比例的名额，其中为表列种姓保留 15% 的名额，为表列部落保留 5% 的名额。这标志着印度高等教育“保留政策”的进一步推进。

深化期（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

1 Jagan Karade, *Development of Scheduled Castes and Scheduled Tribes in India*,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8.

2 安双宏：《印度教育 60 年发展的成就与问题评析——基于教育政策的视角》，载《比较教育研究》2011 年第 6 期，第 67 页。

代)。1989年,辛格政府再次推行《曼达尔方案》,泰米尔纳德邦及北方邦等邦属高校开始为“贱民”阶层保留入学名额,包括其他一些私立高校也开始保留名额。辛格认为,要体现全纳与公平理念,就必须确保社会弱势阶层(特别是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有受教育的机会。这实际上深化了印度高等教育入学制度中的“保留政策”。

成熟期(进入21世纪以来)。2005年,印度联盟政府(UPA)决定在中央大学和私立高校中单独为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和落后阶层增加27%的保留名额,使其名额总体比例达到49.5%。<sup>1</sup>2008年,印度联邦最高法院选择继续支持政府的“保留政策”,并为进入本科与研究生阶段的“贱民”学生提供资助计划,以此作为“保留政策”的补充与配套。印度高等教育“保留政策”进入成熟期。

### 三、“保留政策”在印度高等教育中的作用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印度政府推行的高等教育“保留政策”确实提高了落后阶层受教育水平及社会地位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印度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取得了较大的国际影响。

第一,促进了印度社会不同阶层的上下流动,保障了社会公平。“保留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印度政府推行的高等教育“保留政策”确实在提高落后阶层受教育水平及社会地位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印度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取得了较大的国际影响。**

政策”使部分“贱民”通过接受高等教育的方式实现了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成为这一政策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更加重视高等教育的价值,有更大的动力为子女争取高等教育机会。这种来自既得利益群体的力量,与印度政府旨在推行教育公平的力量形成一股合力,为促进与维护印度高等教育公平注入了强大活力。<sup>2</sup>印度社会发展指标显示:在实施“保留政策”以来,南印度和西印度各邦的社会和经济情况远远好于其他地方,公民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公众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保留政策”在消除国内种姓之间不平等,打破种姓制度造成的职业世袭垄断,提高低种姓和“贱民”在印度政治经济社会领域中的地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提高了印度高等教育的整

体质量,提升了其国际影响力。印度高等教育“保留政策”打破了过去只有少数人享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局面,使落后阶级和弱势群体也可以共享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提高了各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水平,提高了印度高等教育的整体办学质量和办学规模。同时,提升了印度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促进了社会民众——尤其是“贱民”阶层——整体国民素质的不断发展。印度高等教育体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成长为“高等院校数量世界第一(约两万多所)和高校在校生人数世界第三(1,200万人)”的庞大高等教育体系,印度的多所大学在世界上也位于前列。这与印度高等教育多年来坚持实施“保留政策”是分不开的。

第三,维护了印度的政治稳定,提高了国民对印度社会经济的信心。印度《宪法》等法律法规为落后阶级和弱势群体在高等教育机构保留入学席位,实际上是政府给予社会不利群体的补偿和福利。一批受惠于该制度、得到良好教育的“落后阶层”脱颖而出,目前正活跃在印度各个领域。“保留政策”在维护印度各种政治势力间的斗争平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保留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落后阶层”的诸多不满,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这些都提升了整个民众群

1 施晓光:《印度教育“保留政策”问题探析》,载《比较教育研究》2008年第10期,第47页。

2 刘筱:《基于教育公平视角下的印度“种姓保留政策”探析》,载《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15年第3期,第19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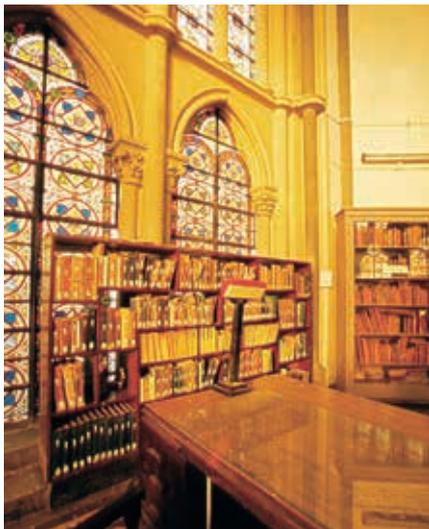
体对印度社会和高等教育的信心。

第四，“保留政策”促进了印度未来高等教育发展愿景的构建。高等教育“保留政策”实施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使得印度得以积极构建未来高等教育发展愿景。2013年，印度工商协会联合高等教育委员会制定并发布了《印度高等教育：2030年的愿景》（以下简称《愿景》）。《愿景》是一个针对未来的、极富有雄心壮志的规划，它预计到2030年印度将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并拥有能满足印度社会需要的高质量高等教育。印度将摆脱当前的限制和挑战，拥有更多有能力的人才，文化教育氛围浓厚。到2030年，印度将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之一，成为全球的领导者。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将有1.4亿，届时世界上每4名大学毕业生中将有1名印度高等教育培养的毕业生。<sup>1</sup>可以看出，印度政府对继续实施“保留政策”和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信心十足。

#### 四、印度高等教育“保留政策”存在的问题

“保留政策”从启动到实施，始终处于印度社会公众普遍关注和争议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保留政策”本身的合理性遭到质疑。“保留政策”存在“公”与“不公”的问题。“保留政策”的目的是追



求教育公平，为落后阶层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得到与高种姓阶层同样的权利和机会。然而，在公平“丰富”的内涵面前，如何定义“公平”，就成为决策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sup>2</sup>这项制度设计的前提是基于种姓制度自身，而不是个体的优良成绩和表现。同样是十年寒窗的学子，高种姓出身在“保留政策”面前反而成了累赘。这种“反向歧视”无疑让人感到该政策自身的明显不公。按照印度宪法的精神，任何群体不论种族、宗教、种姓一律平等，对“贱民”的保留名额本身就是对其他阶层的歧视。同时，印度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经济长期不景气，使得劳动者对工作岗位的争夺也越来越激烈，“保留政策”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公众的批评和反对。

第二，“保留政策”制定本身包含了过多的政治目的。印度著名的政治领袖J·P·纳拉扬曾说过，“印度最大的政党是种姓”。由于“保留政策”的受益者越来越多，印度任何政党都不敢轻言取消。印度各政党将“保留政策”作为解决印度社会中不平等现象的一种有效工具，成为印度政坛上各种势力争相利用的“武器”。在制定“保留政策”具体内容时，更多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不是弱势群体的实际需要。在有些邦，保留数量超过了高校招生总数的2/3。例如：马德亚邦是78%，安德拉邦是71%，卡纳特卡邦和泰米尔纳德邦都是68%。<sup>3</sup>这些比例是相当高的，并不符合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

第三，很多“贱民”的受教育情况和社会地位并未真正改变。尽管“保留政策”实施多年，但当前印度“贱民”学生的入学率仍然不算高，他们在种姓制度中的社会地位仍然偏低。研究表明：尽管表列种姓在教育和职业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他们仍然得不到高种姓的认同和平等对待，因为高种姓传统的种姓等级心理和情结依然没有消失。贱民学生在高校中增加的人数不少，但大多是学习普通专业，而一些“好专业”（就业前景好、收入高的专业）仍然为高种姓的学生所占据。受教育的层次和水平越高，表列

1 李雁南：《当前印度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对策》，载《大学（研究版）》2015年第9期，第63页。

2 王世岳：《美国教育机会补偿的政策困境：以顶尖比例计划为例》，载《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92页。

3 S.Chitnis & P.G.Altbach,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in India: Experience and Perspectives*, Sage Publications, New Delhi, 1993.

种姓和表列部落学生所占的比例就越低。在印度，社会地位最高、排名最靠前的国家重点高校中，大多数仍然是高种姓家庭的学生。

## 五、印度高等教育“保留政策”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教育公平一直是世界教育改革的重大课题。2012年，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发表了《全纳性质量型高等教育扩张：十二五规划》报告，充分体现了印度“十二五”期间高等教育的“全纳”“质量提升”和“扩张”三者协同发展的逻辑思路。中国和印度都制定并实施了以促进教育公平为价值取向的高等教育招生特殊政策：印度实施了高等教育招生保留政策，中国实施了高等教育招生民族优惠政策。这体现了两国政府在追求高等教育民族公平方面所作出的积极努力。印度高等教育“保留政策”可以为我国高等教育提供若干启示。

在追求教育公平方面，中国高等教育可以借鉴印度“保留政策”，使得弱势群体有更多受教育的机会。中国和印度都有巨大的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消灭贫困、促进公平是两国共同面对的任务。印度高等教育“保留政策”以改进“贱民”阶层的受教育状况为出发点，受到无时不在的政治斗争和利益博弈的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更多关注民族优惠政策面临的核心问题与地区平衡。虽然二者的出发点不同，但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印度政府对弱



势群体实施“保留政策”，它反对用机会平等来实现社会平等，直接采取从各个方面来扶持的手段，使弱势群体赶上现代化的步伐，对我国解决弱势群体高等教育问题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我国高校的招生和培养环节可以借鉴印度高等教育“保留政策”的相关内容。我国高校，尤其是名校当中，来自弱势群体的学生总体比例仍然偏低，而且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尽管政府在加大力度，不断出台相关办法，但效果并不太理想。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印度高等教育“保留政策”的相关内容，针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和偏远地区，可以专门制定面向少数民族子女入学录取的相关法律法规，具体对各项优惠政策予以规定，以法律的形式长期固定下来，使各高校有一个参照标准，对促进相关弱势群体进入知名高校学习能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当然，在此过程中，我们也要避免印度高等教育“保留政策”中的“僵化”

和“过于偏激”的做法。

可以借鉴印度高等教育“保留政策”的实施过程，成立专门的机构和部门，负责落实弱势群体的受教育问题。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专门设立了负责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和其他落后阶层的高等教育办公室，对大学入学名额、教学职位和非教学职位保留政策的实施进行有效监控，并处理和解决相关投诉。同时，还设立了一个常务委员会及相关小组委员会，成员由专家、大学前校长及高等教育界知名人士组成，负责监督“保留政策”的实施。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还一次性向每所大学提供20万卢比补助，在大学里建立教育机会平等办公室。截至2011年3月，印度有128所大学设立了“教育机会平等办公室”。设立专门的机构，用以维护弱势群体的教育和就业权益，这些做法都值得我们借鉴。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主编 郭婍庆 赵宗锋

编辑 王惠英

设计 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mailto:icwar@bfsu.edu.cn)

电话: 86-10-88813845

传真: 86-10-88816556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综合教学楼 1041 室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